

©中国封底丛书


遁世与逍遥

中国隐逸简史

何鸣 著

顾问：孔庆东 朱大可 朱建军 江晓原
李国文 苏三 吴言生

中国文人对抗权力和世俗的精神史。

 敦煌文艺出版社



以儒、道为立身根底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积极入世的**强硬外表**下面，

也有一颗时刻准备归隐的**柔软之心**。

凡在非大治则大乱的历史当口，或者明君在朝的创业初期，

治国平天下往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

政治上的失意以及政治生活本身的尔虞我诈与个体生命的冲突，

往往使得他们在最后选择**逃遁**或者**隐逸**。

做隐士既是一种德行的体现，

满足了士大夫们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

更是一种生命本于自然、活出自我的强烈要求。

当被迫的选择成了一种主体的解脱，

隐逸生活可以把他们的精神带向一种纯粹超越的境界，多数选择


隐逸的都得以**逍遥**。

◎中国封底丛书

遁世与逍遥

中国隐逸简史

何鸣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 / 何鸣著. —兰州: 敦煌
文艺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0587-857-9

I. 遁... II. 何... III. 隐士—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39133号

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

作 者: 何 鸣 著

责任编辑: 王 跃 (guzyu@163.com)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7-80587-857-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网 址: <http://www.dhwycbs.com> E-mail: dhwycbs@sina.com

电 话: 0931-8773235 传 真: 0931-8773235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 001

第一节 说“隐” / 002

第二节 说“方” / 008

第二章 隐逸简史 / 013

第一节 上古:隐逸精神的源流 / 014

第二节 先秦:隐逸精神的哲学基础 / 022

第三节 秦汉:强权政治下的隐逸 / 041

第四节 六朝:隐逸精神的高蹈 / 046

第五节 隋唐:隐逸精神的魏阙情怀 / 050

第六节 宋元:隐逸精神的内倾化 / 058

第七节 明清:隐逸精神的世俗化 / 066

第八节 近现代:救国浪潮中的隐逸微音 / 073

第三章 隐逸的形态 / 081

第一节 义隐 / 083

第二节 时隐 / 090

第三节 朝隐 / 104

- 第四节 酒隐 / 117
- 第五节 学隐 / 126
- 第六节 道士隐 / 132
- 第七节 佛徒隐 / 145

第四章 隐之大者 / 153

- 第一节 鲁仲连:墨侠之风 / 154
- 第二节 嵇康:龙章凤姿 / 159
- 第三节 陶渊明:田园酒徒 / 174
- 第四节 李贽:浪翻古今 / 193
- 第五节 黄宗羲:不费弦歌 / 210

第五章 隐士与方士的创造 / 221

- 第一节 隐士与哲学 / 223
- 第二节 隐士与艺术审美 / 224
- 第三节 隐士与山水田园诗 / 226
- 第四节 隐士与山水画 / 228
- 第五节 隐士与茶道 / 232
- 第六节 隐士与医药 / 235
- 第七节 隐士与园林 / 237
- 第八节 隐士与农学 / 239
- 第九节 方士与自然科学 / 241

第六章 隐逸的奇行与变态 / 245

第一节 奇行 / 247

第二节 变态 / 256

第七章 隐逸与当代犬儒主义 / 271

第一节 隐逸的悖论 / 272

第二节 乱世讳隐 / 275

第三节 当代犬儒主义 / 277

后记 / 281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说“隐”

唐代有两首“寻隐”诗颇值得玩味。

一首是大家熟知的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一首是一个名叫丘为的诗人写的《寻西山隐者不遇》，是一首五言古诗：“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关无童仆，窥室惟案几。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差池不相见，黽俛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两首诗都是写一个人到深山里去拜访一个隐士，却没有遇到，或者只是见到“童子”，或者只是对隐士居住的地方“侦察”了一番，对隐士本人没有一点直接的印象。可见“隐士”都是神秘的，他们不会轻易让人发现自己。既然是隐士嘛，就要“隐”得彻底一些，专业一些——“云深不知处”“应是钓秋水”。

从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知道：一、隐士是不能被人找到的人；二、隐士独自生活；三、隐士生活在山林里；四、隐士生活虽然简单朴素，却自得其乐，逍遥自在，普通人都很向往。

隐士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去群体化的生活，讲究个体生存，有点像草原上独来独往的豹子，和群体化生存的狮子不同。然而豹子和狮子相比，算不算隐士呢？应当不算，豹子顶多是一个独行侠。而隐士如果也要“行侠”的话，则会比豹子隐蔽得多。豹子的“独行”是本性，而隐士的“独行”是觉悟。

所以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一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远古的时候，有一只猿，从一降生的那天起就很孤僻，不合群，不参与群体活动，喜欢自己藏在一棵树上，让别的猿找不到它。它也不喜欢与别的同类交流，不和它们一起去捕捉食物，一起嬉戏，甚至如果它是一只公猿的话，也不与母猿交配——当然，也许，没有母猿愿意跟它交配，或者慑于群体的威力，不敢与其交配。它总是单独行动，实在不能自食其力的时候，就到群体里面去抢，然后遭到群体的攻击。

它勇敢地与一群同类为敌，但是被这群同类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或者，它的离去并非如此狼狈，而是主动地退出，在同类全然不知觉的情况下，自动消失了。不管是哪一种离群的方式，其结果总归是独自一个走进密林深处，去寻找一个靠近水源而食物丰富又没有被别的同类占领的区域。这个道路看起来是如此漫长，而它又是如此孤单，如此无助，它并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有多么悲惨，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在动物界中罕见的愚蠢性格，或者是最原始的负气，总之它主动或者被迫地过起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当然，在那个时代，一只单独



竹林七贤(顾绣)

的猿是很难独立生存的，它过不了多久，就会渴死、饿死，随着季候的变迁冻死、热死、病死，或者被另外一群猛兽袭击而死，成为它们的食物。它恐怕不会有善终。

一定会有人不解：嗨，你在写什么？是在讲故事么？还是在说一个寓言？你不是要写隐逸么？难道你的意思是说隐逸精神发端于一只不合群的猴子？你是要从生物进化论上、从自然选

择的规律中寻找人类隐逸基因的最原点么？

答案是否定的。我想决不会有人傻到要从人类的祖先古猿那里去寻找什么隐逸基因。我之所以用这么一个假想的故事来开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用一种轻松又不失庄重的笔调去粗略地勾画一个中国隐逸精神流变的轮廓，而不是穷极其理、务求甚解、皱眉挠须、不嫌繁冗地去讲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这就好比古时说书人好讲的“楔子”。“楔子”讲完了，下面言归正传。

隐士最早是怎么产生的？隐逸精神发源在哪里？

有人说先有“士”，然后有“隐士”。这话自然是不错的。那么“士”又是什么呢？古人云：“士”是一些“通古今、辨然否”的人。通俗一点说，“士”就是那种博古通今、懂得审时度势、明辨是非、善于自我选择的人。那么，这个“士”就不是一般有文化的人，而是一些高士、智者，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文化牛人”“知识牛人”“精英”一类的人物。

那么,这些“精英”从什么时候就有了呢?据《左传》记载,早在尧舜时代就有了这种“精英”,只不过那时专业的叫法是“才子”。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八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这是《左传·文公十八年》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以前高阳氏有8个才子,号称“八恺”,高辛氏也有8个才子,号称“八元”。尧治理天下的时候,尧似乎看不出他们16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竟然没有举用他们。到了舜的时候,舜就很有眼光,知道他们都很了不起,就将他们提拔起来做事,人尽其用。这些人可以说就是早期的“士”了,舜让这些入帮他教化百姓。

这些人很明显都是文化人。但是,在那时候难道只有这16个文化人吗?当然不是。还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没有被尧舜所用,或者拒绝了尧舜的招用,比如许由、巢父、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等等。这里面就有许多故事了。《庄子》作为一部隐逸学著作,里面确实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上古隐士。

可以这么说,有文字记载的隐士在尧舜时代就有了;而且这些早期隐士,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

南怀瑾先生在其《禅宗与道家》一书中认为,隐士思想和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论断。在中国复杂多派的传统思想中,道家思想与

隐士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即使作为儒家开山祖师的孔夫子，在积极入世的强硬外表下面，也有一颗时刻准备归隐的柔软之心。

通过阅读大量的古代文人作品，我们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文人或者士大夫们都把“归隐”当做毕生最向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士大夫们功成名就之后都会有归隐石泉的想法呢？姑且不论这种想法是向往已久还是一时的冲动，至少产生这种想法的文化背景暗示了一点，那就是：做隐士是一种德行的体现，满足了士大夫们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归隐”既有不合作的意思，更有“活出自我，做我自己”的强烈要求。

但是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他们的事迹。我们现在提到的与历史政治有关的“隐士”，也只能算“半隐半仕”的一群，或者叫“半隐士”。所谓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后，或者中间某一段时间，过的是隐士生活，其余的时间，就是出山入世，参与现实社会，和实际的政治有了牵连。不论是在正史典籍或者野闻演义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世外高人出山辅佐明主，荡平天下，拯救世界，创立不世功业的故事，比如姜太公之于周武王、张良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李泌之于唐肃宗李亨、陈抟之于赵匡胤、刘基之于朱元璋。这便形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的景观：凡在非大治则大乱的历史当口，或者建国创业的初期，身在中国文化幕后的隐士们，就会临危受命，挺身而出；而到了治平时期，便又默默无闻，销声匿迹。所以，历来的统治者对隐士既尊重又畏惧，感情颇为复杂，而历代隐士们的命运也常常随之斑驳多变，难以尽说。

姜太公杀华士应该说是历史上畏惧隐士最早的事件。姜太公得封齐国，要杀掉齐国隐士华士，因为他不臣天子，不臣诸侯，请他三次也不肯出山，这就让以前也是隐士的姜太公很害怕。姜太公心想，你小子要干什么，敢不跟我合作？现在都天下一统了，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姜太公思前想后，总觉得这个华士是块心病，于是动了杀心。姜太公是知道隐士的厉害的，因为他自己就曾经是个大隐士嘛，渭水垂钓，愿者上钩，大家都是知道的；又加上初到齐国，旧有的地方势力还不是很听话，他决不容许这种不合作的事情出现。周公就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杀华士，他的回答相当露骨，可以说是毫不客气：如果像华士这样的人不杀掉，难道让我去表扬他吗？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我还怎么做齐国的君王呢？姜太公的意思就是天下之大，莫非人臣，你不向我称臣，我就只好杀你了。

像姜太公这样赤裸裸杀隐士的事件还是少数，后来的统治者都懂得了杀隐士的负面效应，所以都变得很聪明，看你不顺眼，想杀你，至少得找个借口，给你弄个罪名在头上。

而尊重隐士似乎也是统治者们很愿意搞的事情。尧让位于许由，周朝尊重伯夷、叔齐的气节，汉初隐士“商山四皓”做太子的老师，都是尊重隐士、重用隐士的好例子。此外，历代帝王向山中隐士们动问国家大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最有名的莫过于南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所以，在历代文化著作中，便有上古的隐士、秦汉以后的“神仙”、唐宋时代的“高士”“处士”等无位而得高名的事情产生。尤其在宋代，有一类处士，常常因这种隐逸的姿态得到皇帝的赏识而一举成名，致使后人笑他们是“功名捷径在烟霞”。后来的理学家们的讲学不仕之风，都是受这种隐

逸文化的影响。

隐逸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流变，从古代而近代而当代，其中的千回百折、个中趣意，难以尽说。至于说到当下，是否还有隐士，传统隐逸精神的脉络在当下精神形态中延伸到了哪里，这又是一个难以一两句话说清楚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在如今这个已经毫无隐私可言，视隐私神圣不可侵犯而又不可能不被侵犯的社会里，隐逸文化依然存在，并且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隐士的存在也是如此。当代的隐士已经不可能到深山大泽中求得隐身，他们是彻彻底底身居闹市，出入街衢，和平常人别无二致的“心隐”之徒。

当代隐士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加日常化，也可能更加诡异多端了。边缘艺术家里有没有隐士？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中有没有隐士？网络聊天室里的匿名网民，BBS上的莫测高人，博客日志的书写者们，在他们中间有没有隐士？超市里，公交车上，街道上，乃至路边的棋局里，迎面而来擦肩而过者，都可能有隐士存在。当代生活的密集和人与人之间貌似无缝链接，并没有将隐士的生活空间挤压为零；相反，更多的隐士在你身边，而你无从知晓，无从猜测。他们的隐逸空间在另一个向度和层面上更加扩大了。

第二节 说“方”

“方士”其实也是隐士，但“方士”值得单独一说。

为什么呢？因为“方士”这个名词在中国几千年以儒家为正统文化的偏见之下，已经被历代读死书的知识分子们贬抑得面

目全非,有必要为其正名;还因为作为道家文化一个旁支的中国“方士之学”实在有待更加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它几乎涵盖了最初的所有自然科学门类。

简单地说,“方”是指某种学术技能,“方士”则是指拥有这种学术技能的人。方士大多都是隐士。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说其他的隐士都是“文科生”的话,那么,方士则是隐士中的“理科生”,也就是说,所谓真正的方士,乃是中国古代真正的科学家。

但是,“方士”这个名称在历代的文化演变中,渐渐变成一个被人轻薄鄙视的名词,这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受儒家正统文化的偏见影响,方士一直被历代的“文科生”们视为江湖术士,与走江湖耍把戏、变魔术混饭吃的人混同一起,认为他们的阴阳不经之说、炼制神仙丹药之术,都是奇技淫巧、不足为法的学术,用来欺世盗名、蛊惑人心,于世无益,于人有害。正是由于这种偏见,我国的传统文化养成一种重文轻理、重物轻用的坏毛病,置自然科学的发展于不顾,终于在近代历史上自食恶果。而对我们上古原始科学的发现与研究,在这种轻视的观点之下,也永远沉埋在“方外”了。

关于“方士”名称的来源,比较可靠的资料,首先见于战国时代的著作中,其中,庄子曾经



青岛琅琊台上的“徐福上书秦始皇”石雕群像

提出“方术”这个名称。秦汉以后，“方士”之名开始通用。《史记》称方士出于燕、齐之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秦始皇迷信方士而求神仙，汉武帝也受到方士的蛊惑到海上求仙。其中，徐福可能是最受争议的一个所谓生长于燕、齐之间的方士了。有关他说服秦始皇亲率五百童男童女出海寻仙的传说，一直被做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说他是一个骗子，但也有人专门成立了学术机构，加以研究。

由于司马迁详尽描述了汉武帝的愚痴与迷信以及方士们欺诈的丑态，后世对于方士的认识大受其影响，认为方士都是丑陋可鄙之人。其实，司马迁对真正具有价值的方士并没有偏见，只要他们的学说与方术技能足以影响人心，有利于社会，就为他们一一作传。如属于阴阳家的驺衍，属于医家的扁鹊，以滑稽见长的东方朔，以及属于占卜的《龟策列传》，乃至后来与方士合流的游侠，还有天文、历象研究的专家等等，都有极为详尽的描述，择要说明其特长和行为。

为什么说方士出于燕、齐呢？

司马迁游历齐国，说过这样一段话：“自鲁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所谓匿知，有两个解释，一是说有深沉的智慧，二是说富有神秘性的知识。齐国的管子，在其所留传的著作中，不论真假的成分有多少，即使认为十分可靠的几篇，仔细读来，仍然让人感到“其文不雅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让人感觉不可信、离奇古怪的地方。《晏子春秋》也和它差不多，都是代表齐国人文学术思想的书籍。庄子在《逍遥游》中，也提到齐国有一本怪书叫做《齐谐》，又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就是说《齐谐》这本书是齐